

他未曾远去

——深切怀念孙殷望老师

○刘惠莉（1997级硕，历史）

世事难料，生命无常，没想到孙殷望老师这么早就离开了我们。想想真是令人伤感。我作为孙老师编写《清华大学史1948—1976》（第二卷）的助手，与他交往已经整整10年。这10年中，我不但见证了孙老师辛勤撰写《清华大学史》的整个过程，也见证了他与病魔抗争的全部过程。在这些过程中，我对孙老师的人品、个性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我们之间也从最初的工作上的合作关系慢慢发展为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我在历史系念书时，孙殷望老师是人文学院的党委书记，因当时主要是以系为单位活动，所以对他并不熟悉。2004年夏，我刚调到校史研究室，正值学校启动《清华大学史》编写工作。学校聘请了三位在清华学习、工作了一辈子、对清华各方面情况既了解又擅长写作的老同志撰写校史，同时，校史研究室的三位年轻人则分别分配给三位老同志作助手，协助他们资料查询、书稿打印、核校等工作。我被分配给孙老师当助手，协助其完成《清华大学史》第二卷的写作任务，由此我们开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说实在的，撰写一部完整的《清华大学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代表学校来写，其客观性、权威性都要求撰写者必须以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三位老同志之所以在退休后本该安享晚年

轻松生活的时候接下这个艰巨的任务，完全出于他们对母校的热爱和一份责任感。孙老师曾长期在校机关工作，撰写过上百万字的报告、总结、简报等文稿，是清华园有名的“笔杆子”，如果单纯从写作来说，对于他，这并不算是一件难事。但是要写一部完整的从1948年到1976年间清华的历史，却决非易事。在经多次校史编委会讨论、修改过的编写大纲的基础上，孙老师开始了校史撰写工作，查资料、阅读史料、做卡片、写作，成了孙老师生命中最后10年的最主要内容。

2004年接下写校史任务时，孙老师刚再婚不久。因夫人刘祖荷老师家在和平里，所以他也常常随之住在城里，夫人教钢琴，孙老师伏案写校史，各自干着喜欢的工作，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我印象中，认真的



2013年4月29日，作者与孙殷望、刘祖荷夫妇在校史馆合影

孙老师基本上每周都会来校史研究室一次，来之前，他会给我打电话，让提前准备好他需要的资料，或者是卡片纸、稿纸、签字笔之类的文具。后来他们回到学校住，孙老师更是几乎每周至少来校史研究室一次。也许是脾气相投吧，在经过短暂的了解之后，我们很快就成为相互信任、无话不谈的忘年交。所以他每次来，除了处理与校史写作相关的事情之外，我们总能畅聊一会儿，各自的家庭、工作以及我不知道的种种清华的人和事，都能聊。对于我的提问，他总是知无不言，有问必有答，真诚而坦率。我很少听到他谈论别人的缺点，但说到他自己时，曾经出过的洋相、有过的失误、缺点却从不向我这个晚辈隐瞒。有时候，当我对某个问题表示出与他不同的看法时，他也不跟我计较，很宽容。

孙老师是清华最早开设公文写作课的教师，他的公文写作教学在校内外小有名气。在校史写作之余，孙老师除了承担每年的全校职员公文写作培训课程，也会给其他一些单位讲点公文写作课。因此，我除了帮他在撰写校史方面查资料、打印、核校、送审书稿外，还帮他做一些其他方面的工作，如制作、修改课件，收发电子邮件等。这些工作，对我来说，属举手之劳，很快就能干完，但孙老师夫人刘祖荷老师总感到过意不去而责怪他，每当这时，听说孙老师总会说：“没事，小刘人好，她很乐意做。”看到孙老师跟我不客气、不见外，我也很高兴。但还是有一天，他们夫妇俩专门到我办公室来，将刘老师亲手做的一个大面包送给我，以表达感谢之意，反倒让我很不好意思。

孙老师的校史写作工作一直在按计划

进行。每写出一部分书稿时，他会交给我送去录入，由我排版、校对后再由他修改。毕竟是多年练就的功夫，孙老师的手稿总是干净、工整，很好辨认；如要修改，他会另写一纸用胶水整齐地贴在稿纸上，不会使人产生凌乱的感觉。2012年7月底，历时8年、近50万字的《清华大学史》第二卷初稿终于完成。该年年底，书稿被送交到一些校、处级老领导手中审阅。对于写作过程中碰到的一些问题，孙老师希望在充分听取大家意见的基础上再作进一步的修改。

校史的写作暂告一段落，孙老师明显轻松了许多。2013年1月，他和刘祖荷老师去海南住了一段时间。在此前后，他又接受了老教授协会的委托，撰写了《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蒋南翔》《先生的品德风范山高水长——记两院院士张光斗》（与王光纶合著）两篇文章（分别收入老教授协会主编的《大师风范——人文社会科学界》《大师风范——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界》两书中，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6月初，孙老师夫妇又去俄罗斯旅游，能够到十月革命发生地冬宫看一看，亲临列宁墓所在地莫斯科红场，孙老师显得格外满足，我理解，这些地方是一名老共产党员心中的圣地。回来后，孙老师感到身体不适，便去医院做检查。2013年7月，他被查出患有结肠癌。至今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孙老师在两年前的体检中就发现有便血，但是大大咧咧的他根本没有将之当一回事，以至延误了病情，发展到严重的程度。不过，当时我们并没有多想，还认为这种疾病是癌症里面比较好对付的，我想孙老师也差不多是这样想的。手术做得

□ 师友情

很及时，从住院检查到手术后出院，前后差不多一周就结束了。手术后的孙老师除了瘦点，精神上基本没太大变化。

因为对病情乐观，加之开朗外向的性格，当见到熟人时，孙老师会主动告之自己的病情。但毕竟是癌症，想到“未来的时日已屈指可数”，他决定在有生之年写一本自传，希望通过“回忆与总结自己的人生经历，从中厘清是非得失，领悟人生的要义与真谛，以自省后觉示之于人，均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意义。”在化疗的过程中，孙老师开始撰写自传，并定名为《60年清华岁月》，计划分十章完成。

孙老师化疗进行得比较顺利。在此过程中，除了化疗必然引起的各种身体指标较大幅度地起伏升降外，其他副作用相对较轻，这让我们感到欣慰。2014年1月10日，是孙老师第八次化疗的最后一天，因家人都患感冒，怕传染，孙老师打电话问我能否过去照顾一下。我立即赶到了医院。只见他两只胳膊都插着管子，虽然消瘦但精神很好。可能是即将完成化疗吧，他很高兴，我们滔滔不绝地聊了很长时间。大约下午2点半左右，当护士将化疗用的针管全部拔掉后，孙老师如释重负般地一边看着手表，一边大声对我说：“我要记住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时刻。”是的，对于一个热爱生命的人来说，化疗的顺利结束不就意味着击败了病魔吗？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时刻。

化疗完成之后，孙老师除了定时去医院开药、做各种检查外，就是全力以赴地抓紧写他的自传。在我们的祝福和期待中，他的身体似乎在渐渐恢复。然而，大概是4月中旬的一天，我下班后去家里给他送

稿子时，发现他的脸色非常黄，他告诉我胆管有点堵。后来得知他们去了三院。4月21日一大早刚上班不久，我就听同事说孙老师病情不好，已从三院转回到校医院，这也就意味着无法继续接受治疗只能保守维持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非常意外，因为这离上次看他仅仅一周左右的时间，这怎么可能？我将信将疑，直奔校医院而去。赶到病房时，只见屋子里坐满了前来看望他的以前的同事和朋友，依然消瘦、脸色发黄的孙老师躺在床上，精神却很好，声音仍然洪亮，谈笑风生；床上的小桌子已经摆上了《清华大学史》书稿、他还在写的自传以及一塑料袋他以前写的手稿和剪报，此外，还有一张我曾经帮他找的《光明日报》，上面刊登有一篇关于他最喜爱的一名援疆学生的报道。看到这些，我不禁松了一口气，我安慰自己：情况并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严重。但出来以后，王小宁老师告诉我，孙老师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但他本人并不清楚。虽然难过，但以为孙老师精神那么好，即使不能彻底治愈，至少维持个一年半载的总可以吧？

到校医院后，孙老师每天输完液之后还在写他的自传、修改已经写完的部分。每天来看他的人依然很多，门口的提示条基本上不起作用。有的老师为他送来了播放机，还录了些歌曲。想到他是安徽人，我也下载了一些黄梅戏给他，但他说更喜欢京剧和相声，于是又重新下载了送过去。渐渐地，孙老师明显感到精力不济了，说起话来声音也没有那么高了，到后来连软烂的食物都无法吃，基本上只能靠输一些营养液维持，脸上也更加消瘦。5月26日，王小宁老师打电话让我到校医院去，孙老

师打起精神给我俩交代修改他自传的事。因为之前计划写十章（后调整为七章），标题是“60年清华岁月”，然而随着病情不断恶化，可能他自感无法完成，便将题目改成《自省后觉 忆悟人生——我在清华58年》，还想重新调整结构，并添加一些小标题。因当时恰好有人来看望他，我、王小宁、刘老师便到病房外稍坐。这时刘老师给我们讲了孙老师的病情，说是癌细胞已扩散至大脑，非常危险。听到这个消息，我再也无法抑制难过的心情，本该安慰刘老师的我，却泪流不止，以至无法讲话。不想面对的事情终将要面对！我真正意识到孙老师的离去竟然离我那么近，他的时日真正屈指可数！

我和王小宁老师都想抓紧为孙老师做点事，希望在他生前就能看到书稿印制出来。我们按照他的意见，分工录入、修改他的稿子，还把他十年前的一篇未发表的文章也打印出来。因为第三章还没有写完，孙老师只好先记下想写的标题，我安慰他，等有精力时，先帮他口述记录下来再整理。然而不巧的是，校医院要改造设备，要求所有住院病人在6月10日前转院搬走，这真是一个不幸的消息。能踏踏实实地在所热爱的母校离去，对于孙老师而言，也是一种幸福，然而这也成了奢望。因周边条件相对稍好一点的医院病房床位全部满额，为了照顾方便，王小宁帮孙老师联系到了离她家较近的温泉老年医院。

孙老师还在惦记着他自传。他给我们交待对书稿设计和排版的要求，希望能设计得漂亮一点，还专门提出要加上他家乡丫山的照片、当年入学的证件照、与母亲及家人的合影以及不同时期的工作照，还

希望帮他查找列出学术成果目录。正是在这最后不多时日的相处过程中，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家乡、亲情、母校、事业在孙老师心目中的位置和分量！

自得知孙老师的严重病情后，基本上每天中午我都会去看看他，陪他说说话。他也很关心我，每次去，都要问问孩子高考准备得怎样了？叮嘱我好好照顾。有两次正好碰上别人来看他并留下一些水果，他坚持要让我带一些回去给孩子吃，我想这是孙老师的一份心意，只好遵命。到后来，有的时候孙老师虚弱得不想开口讲话，我就静静地坐在旁边，陪他一会儿，因为这样的时刻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屈指可数的。

6月9日早晨，孙老师转院。我赶到校医院时，孙老师和家人以及好几位老师已在等候救护车。孙老师鼻子插着氧气，虚弱地躺在床上，偶尔吃力地与我们说上几句。等了一会儿，救护车来了，当孙老师起身下床准备上担架时，眼镜从他的脸上滑落下来，因为他消瘦的脸上已经戴不住眼镜了，他还问大家：“今天我的脸色怎么样？”我们只好违心地安慰他：“挺好的。”目送孙老师离去，我心情十分沉痛，他一定是充满了对清华园的不舍！我只有默默祈祷，希望他能再坚持两个月，等校医院工程结束后再回来住。

想到孙老师去温泉老年医院后要做各种检查，为了不打扰他，我和同事计划过几天再去看他。6月12日下午，王小宁老师兴奋地告诉我：孙老师好多了！上午她去看孙老师，孙老师与她聊了足足两个多小时，高兴时还架起二郎腿，并且还有续写自传的计划。6月13日下午，我去孙老师家，和刘老师一边为自传挑选照片，一

□ 师友情

边说起孙老师的情况，刘老师也高兴地跟我说，确实好多了！我由衷地为孙老师高兴。6月14日上午，我因参加孩子学校举行的成人礼仪式，将手机调成静音，活动结束后，看到有刘老师9点多打来的电话，赶紧回过去，才得知孙老师已于早晨5点多去世了。

孙老师走了，我对他有很多不舍，十

年的相处使我们已经结下了很深的友谊。我也为孙老师没能坚持到再回清华园而深感遗憾，我了解他，知道清华园里有他太多的不舍与牵挂！但是，我也为孙老师感到欣慰，在他即将离开人世时，他的亲人、好友都在身边陪伴他，他走得不孤单！

2014年10月23日

愿得此身长报国

——缅怀梅祖彦先生

○张光华（1963 建筑）



梅祖彦先生（1992年）

岁月流逝，清华校友总会原副会长、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梅祖彦先生去世已经12年了。最近从《西南联大行思录》一书中得知，清华大学校园内有一座复制的西南联大纪念碑，碑上刻有包括梅祖彦先生在内的抗战期间从军学生名录。校庆日上午，我满怀感念之情前去凭吊。经在校同学指点，沿大礼堂后面的校河南岸，往东北方向不远，在一块偏僻的空地上，找到

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在“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中，右起第8行第12名为“梅祖彦”，不禁潸然泪下。

从1957年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到1963年毕业，我经常在新水利馆和旧水利馆的教室上课，但并不认识水利系的教师。直到1980年《清华校友通讯》复刊以后，我才在《通讯》上面看到梅先生的名字，知道他是梅贻琦老校长的儿子，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中断学业参军抗日，曾担任美军翻译。抗战胜利后在美国完成学业，于1954年回到清华任教。但我无缘和梅先生相识。

在我大学毕业30年后，一场意外的灾难使我陷入困境走投无路，是梅先生以全国人大代表的名义为民请命，才使我看到了一线希望。说来有点话长。

1994年3月，一个意外的发现使我怒不可遏。在我工作的某建筑设计事务所，所长不但非法克扣我的津贴，还冒领我的